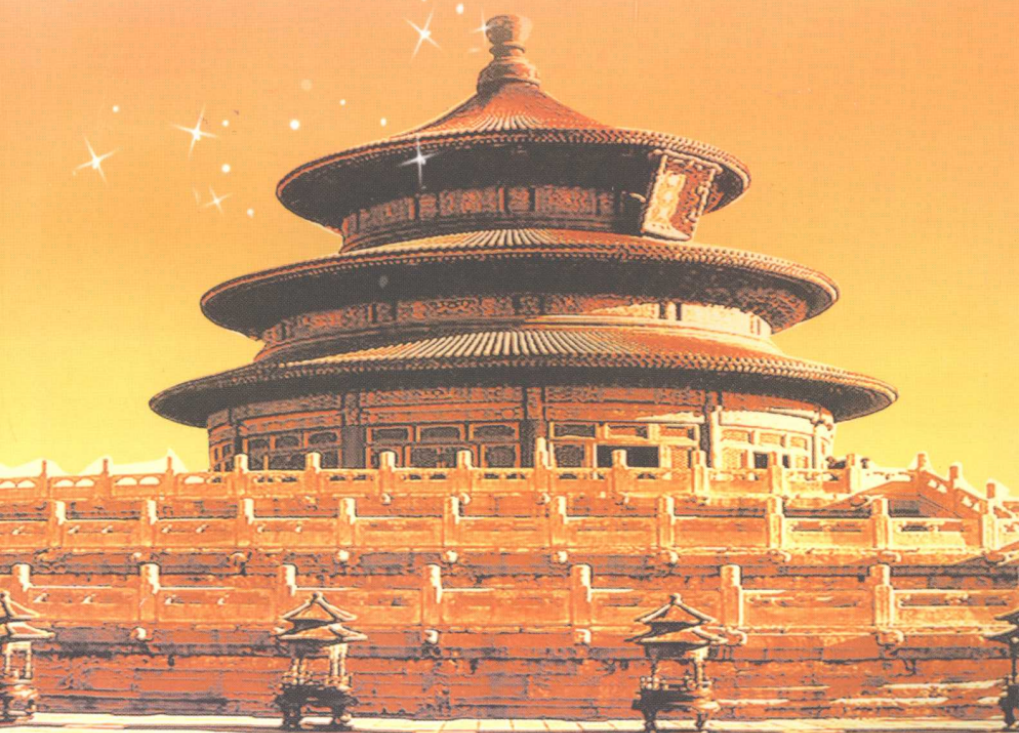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

刘海涛 王琳琳 编 著
张庆国 张月梅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

刘海涛 王琳琳
张庆国 张月梅 编著

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刘海涛等主编. —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1131-481-6

I. 中… II. 刘… III. ①文化史—中国②中华民族—民族精神
IV. K203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9334 号

责任编辑:张红梅

封面设计:田 华



NEFUP

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

Zhongguo Wenhua Yu Minzu Jingshen

刘海涛 王琳琳

张庆国 张月梅 编著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和兴路 26 号)

佳木斯大学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44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ISBN 978-7-81131-481-6

定价:23.00 元

前 言

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劳动创造的产物。对于现代人来说,自先秦以来的传统文化,似乎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而事实上那些文化原典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我们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对现代的影响,不仅是深远的,而且是入微的。我们的民族精神,即是由那些传统文化所浇铸。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性,从某些方面来说,正是那些文化原典的表现。

但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文化发展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彼此融合,并不断地叠加到原有文化积淀之上,丰富了原有文化的积淀。时至今日,对青年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已基本形成共识。文化教育,归根结底是素质教育而非能力教育,通过学习能获得人文素质的提高,就是巨大的成功,也就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文化不断积累和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先进文化和滞后文化相比较而存在,相冲突而发展。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它往往具备以下的条件:第一,能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第二,能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第三,能继承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吸取当代科学发展的积极成果。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与我国封建主义文化相比曾有先进性,所以中国的仁人志士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向西方学习。但后来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包括我国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从此,中国文化就转向了社会主义,即当时先进文化的方向。改革开放使我国有可能与世界各国文化重新交流,从而也有可能更好地吸纳当代一切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因而 20 多年间,我国的文化建设有飞

速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代我国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对我国当代先进文化的理论内涵所做的最全面最科学论述和阐明不同社会形态的文化中,决定其性质的是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核心和灵魂,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长期陶冶的结果。离开了一定的文化传统,就无所谓民族精神。章太炎尝谓“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求真务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性。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研究和探索民族精神的热潮正在全社会兴起。

全球化背景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大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战略任务提出,这在党的纲领性文献中还是第一次。由此可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战略意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灵魂,一旦丧失了民族精神,必然导致民族文化的衰落,甚至导致整个民族的衰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如何有效地防止西方一些国家的“分化”图谋,保持民族文化的生机和活力,最重要的是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为民族文化注入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民族精神,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有抵御外侵的战斗能力。

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中,我国还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常抓不懈的根本任务。山东大学的张锡恩教授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当今培育民族精神的指导方针和宏伟纲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创造以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的,以民主、自由、法治、平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总之,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都要采取扬弃的方式进行继续发扬,并在继承中创新发展,最终培育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的、以民主自由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民族精神。

我们深知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博大精深,要编撰好一本涵盖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书并非易事。本书以中国文化及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为主线,先从传统文化和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入手,到近代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转型,再到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这是纵向的主线。在每一个大的时期内,又有横向的安排。在编撰的过程中,唯愿本书所汲取的内容能让读者品尝到一点清新的味道。但是,因为篇幅及能力有限,我们要想挖掘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本书还存在着很多的欠缺之处,希望读者能够批评指正。

编 者

2009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传统文化概论.....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1)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11)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17)
第二章 古代中华民族精神	(33)
第一节 中华民族精神概述	(33)
第二节 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38)
第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	(49)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49)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	(53)
第三节 “五四”精神的文化反思	(60)
第四章 近代精神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新拓展	(76)
第一节 略论近代中华民族精神	(76)
第二节 传统文化精神在近代焕发的生机	(78)
第三节 近代启蒙思想家对西方观念的摄取	(81)
第五章 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	(89)
第一节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89)
第二节 民主与科学.....	(108)
第三节 忧患意识与赶超意识.....	(125)
第六章 弘扬传统文化 创建先进文化.....	(143)
第一节 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143)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147)
第三节	先进文化的根本任务·····	(152)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化创新·····	(160)
第一节	中国先进文化论的理论渊源·····	(160)
第二节	先进文化的历史进程·····	(178)
第三节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创新·····	(194)
第八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217)
第一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的发展历程·····	(218)
第二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 特征和战略地位·····	(225)
第三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 内容·····	(234)
第四节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 原则和指导方针·····	(262)
第九章	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274)
第一节	民族精神是个开放的体系·····	(274)
第二节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当代价值·····	(280)
第三节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途径·····	(284)
后 记	·····	(305)

第一章 传统文化概论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连续体。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建立在虚无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经过批判的传统上,在母体文化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中国先进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渊源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国有 5 000 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辈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要创造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就必须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认识其所具有的特质和优势,是我们继承这份宝贵精神遗产的前提。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五四运动以前的几千年,中国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结构、政治体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传承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现代社会的中国古代文化。从广义的范围讲,是指历史上形成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各種事务;从狭义的范围讲,是指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规范、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我们所探讨的是狭义的观念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渊远流长,经历了5 000年漫长征程,其发展演变主要由以下几个时期构成:

一、远古时代:中国文化的萌生期

历史学家习惯地把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称为远古(或上古)时期。中国古代文化正是起源于这一极为遥远的时期。人类学家发现,距今1 500万~1 000万年之前的拉玛古猿,是人类的先祖之一。在我国云南的开远县和禄丰县,均发现了古猿的化石。1965年,在距开远、禄丰不过百里的元谋县发现了元谋人化石。这两大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蓝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有了人,就有了历史和文化。从元谋人、蓝田人(陕西蓝田)、北京人(北京周口店)、和县人(安徽和县),到丁村人(山西襄汾县)、马坝人(广东曲江),再到河套人(内蒙古河套)、柳江人(广西柳江)、资阳人(四川资阳)、北京山顶洞人,在这样一个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文化逐渐萌生。

我国远古时期的文化呈繁花初绽的景象,原始艺术与原始宗教是其主要的存在形态。这一时期的艺术品,主要有陶塑、陶绘、木雕、骨雕、石雕、玉雕、漆器等。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制陶工艺已很精湛,彩陶的造型和纹饰体现了原始人丰富的审美追求。陶绘的图案多样而精美,有鱼形纹、鸟兽纹、花果纹、席纹、编织纹、三角形、方形、菱形等,千姿百态。木、骨、石、玉、牙雕等工艺也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如早在7 000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就出土有刻着花纹的象牙杯和象牙长尾鸟,其中鸟的形象生动逼真,雕工精细。此外,具有强烈模仿人类生产生活特征的舞蹈也出现了。在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的伴奏中,人们手舞足蹈表达各种情感。

原始宗教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主要表现为灵魂崇拜、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原始人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人死

灵魂犹在。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装有幼童或婴儿的瓮棺的盖子上留有一个小孔,是供其灵魂出入的通道。山顶洞人在埋葬死者时,在其身上和周围撒上许多象征血液的赤铁矿粉,意在呼唤生命。这些习俗说明古代先民已经有了“灵魂”观念,出现了灵魂崇拜。史前人类由于思维能力低下,对千变万化的大自然缺乏科学的认识,于是对自然物及自然现象产生出种种幻化观念,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自然崇拜的具体物象,主要有太阳、大地、山、水、风、雨、雷、电等。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人们常常发现太阳图形的纹饰。与此同时,出于对自身繁衍的极大关注,又产生了炽热的生殖崇拜。从辽宁牛河梁和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丰乳肥臀的陶塑女神像,在广阔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发现于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都展示了先人对生命祭祀的庄严感情。图腾崇拜是较高级的宗教形式。中华先民认为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植物有特殊关系,作为氏族的标志加以崇拜,这便是“图腾”。图腾的对象有鱼、鸟、蛙、龟、蛇、熊、虎、马等自然物,以及经过抽象概括了的龙、凤等幻想物。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龙是各种图腾的综合性形象,反映了远古氏族走向融合和中华文化多元共生的特征。

二、夏商周:中国文化的雏形期

中国文化在走过了远古的萌生时期之后,至夏、商、周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生期。文字的出现使中华民族跨入文明时代。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认知水平的局限,人们对许多自然的和社会的现象无法理解,便认为这些现象背后有无所不能的神在起作用,致使这一时期的文化以神为本,用《礼记·表记》中的话来说就是“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那时的人们事无巨细总要卜而又卜,以求吉利平安。这种以“天帝”、“上帝”为最高存在的神学观念广泛地见诸于甲骨文、典籍以及青铜艺术品之中。例如,卜辞中有“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今二月帝不令雨”等。殷人认为是天

帝掌握着降雨权,二月不下雨是天帝的命令。这种天神至上的观念贯穿在殷人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周人灭殷后,把殷人所奉行的宗教精神继承过来并加以改造,引进了“德”范畴,以解释王朝兴替、人事盛衰等社会现象。周统治者思考殷人敬天不谓不诚,天为什么要殷灭周兴呢?结论是“天命靡常”乃是由于“民心无常”。那么,促使上天转命的原因是什么呢?周人以殷为鉴,看到只有宜民宜人,施行“德政”,才能得到“民心”,长治久安。因此,他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德”字及其思想为周人所独创,“德”的含义,郭沫若解释为两个方面:在主观方面是指心正,包括对人不苛责、不侮慢;在客观方面是指不懈地努力治事。“保民”即为了保护其统治而讲究统治策略,以使人民拥护而不反对其统治。具体来说,就是要“知稼穡之艰难”,“知小民之依(痛苦)”。“敬德保民”的思想和措施,说明周人不再像殷人那样听命于天,而是逐渐把对“天”的信仰转化为对“德”的追求。尤其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在摄政7年中制礼作乐,倡导道德理性精神,制定周礼并广泛实施,不仅使周人强大,而且为后来儒家主张“德”治提供了依据。

在殷周之际,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原始的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于西周初年的《易经》,虽是一部卜筮之书,但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和深刻的辩证思维,它所揭示的宇宙和人生道理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易传》依据“物极则反”的法则,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观,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自强之说,虽然是朴素的,却是非常深刻的,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类的最高智慧。

公元前722年,周平王被迫东迁。这不仅标志着周天子权威的失落,而且意味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和大变革,这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思想素材,也使他们“救世之弊”的社会责任感倍增,促使思

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按照西汉学者刘歆的说法,气象恢宏的先秦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 10 家。这 10 家中以儒、墨、道、法对后世影响最大。各家既相互批判,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通过对周礼的研究和整理,把带有天道神学色彩的礼转换成伦理道德之礼,而这个礼的核心就是仁,以仁释礼,仁礼结合,形成仁礼一致的思想体系。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从政治作用看,仁是礼的精神支柱,仁礼一体;从主体修养来看,恭、宽、信、敏、惠是实现仁的具体要求;从血缘关系来看,孝悌是为仁之本;从人我关系来看,忠恕是为仁之道。孔子以后,孟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仁学思想,他提出仁、义、礼、智的四端说,并将儒家学说发展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修身理论,使儒学成为先秦诸子百家中最大的一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如果说自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是儒家学说广为流传的话,那么,到战国中期就是“儒墨显学”并行天下。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出身贫贱,生活俭朴,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态度截然不同。墨家的基本主张是兼爱、非攻、尚贤和节用。墨家认为攻人之国最为不义,并以兼爱互利之说反对攻人之国、攻人之身,试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墨家不赞同儒家的亲亲主张,提倡尚贤,即选拔贤人来治国,主张“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家还主张节用,即反对生存基本需要之外的消费,凡饮食、衣服、丧葬、其他日用物品等的消费,都要“去无用之费”。这些思想反映出小生产者和中下层劳动者特有的文化性格。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认为世界万物都源于“道”,万物运动的规律也是“道”,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是无为的,因此,“道”的本质是“无”。人世间的思想原则是“无为”,

人性要“清心寡欲”，如水一样能滋润万物而不与相争。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这一无为思想，他只求精神完美，要超脱一切是非、物我，并在自己的人生活动中处处遵循这种无为逍遥的生存方式，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道家思想包含着较多朴素辩证法思想，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曲则全，枉则正”，“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合抱之木，作于毫末”等，都反映了事物矛盾的依存性、相互转化性，辩证地提示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与道家相反，法家重人道而不重天道。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人物，一切都着眼于现实的功利。韩非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思想，并由此制定出治国方略，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的。尽管法家在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问题上与儒家尖锐对立，但在重人道轻天道，倾心于社会人生问题方面，两家却有相通之处。重人道成了儒法两家共同的追求和理论特点之一。

由上可见，儒、墨、道、法四家在其学说的表征上虽各不相同，儒法人道显赫，道墨天道昭著，但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却是共同关注的课题。各家学派在学术争鸣中相互批判、吸收、渗透，提炼自家学说，吸纳别家学说之长，并发展了相互联结的方面，这样，在各家学说渗透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

三、秦汉魏六朝：中国文化的定型期

中国思想文化的统一及其相应制度的建立，是在秦汉时期。公元前 221 年，经过多年兼并战争，秦始皇终于完成统一大业，建立起了中国历史是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统一帝国。秦统一中国后，在许多方面进行改革，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车轨、历法，并实行“书同文，行同伦”。书同文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从思想交流工具、文化载体——文字使用一体化方面促使民族文化形成。

秦亡汉兴之后，汉初奉行黄老思想，无为而治，这一政治方针虽然繁荣了经济，培养了国力，但不适合于统一大帝国的治理。董仲舒从“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出发，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

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专立儒学《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余家皆废,使儒学成为官学,从文化政策上确立了儒学之独尊的地位,也为后来以儒为主的文化模式提供了蓝本。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文化、学术诸领域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清代,前后长达2 000年之久。

经黄巾起义军的冲击和董卓之乱,导致汉王朝的瓦解,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与战乱时期。由于分裂割据、政权林立,大一统时代思想上的专制主义难以实施,而源于先秦的诸子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又复兴起来,道家、法家学说尤为活跃。由于连续少数民族入住中原,与广大汉族人民逐渐融合,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多民族交融的特点。这一时期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为隋唐以后儒、佛、道三家鼎立的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魏晋时期,玄学成为代表性学术思潮,控制了思想文化领域。玄学是因研究阐发《老子》、《庄子》、《周易》这三本书的玄理而得名。玄学提倡“尚自然,笃名教”。他们杂糅儒道,探讨世界现象的本体,其中习课题是探讨一种理想人格上的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了本体论,由此带来了“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同时,玄学在探讨世界本体过程中,富于理性思辨。如王弼对“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命题的论述。他在《周易略例》中,对“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多层次的解析,说理抽象深入。玄学的这一思辨性特征,对其后的中国文学艺术等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四、唐宋:中国文化的繁荣期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唐人以气吞日月的磅礴气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谱写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使中华文化走向成熟与繁荣的黄金时代。以强盛的国力为基础,唐代文化首先体现出一种无所顾忌的兼容并蓄的气派,奉行立足于我,夷为我用的文化开放方针,广为吸收外来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

和西方世界的各种文化及医学、建筑艺术等,如同“八面来风”一齐涌入唐帝国,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广度与深度。这种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堪称典范。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代的差异时曾这样写道:“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礼堂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与以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儒、佛、道三者并行的政策。

规模空前的强盛与宽容造就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辉煌成就,举凡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学宗教、学术思想,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唐宋文学光彩夺目。唐代诗歌可谓气象万千、群星璀璨,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最高峰。清朝康熙年间编成的《全唐诗》,辑录唐诗 48 900 多首,作者达 2 300 余人。其数量之巨大,内容之广泛,艺术之精纯,风格流派之多样,是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与唐诗相比,宋代文学最大的成就是词的产生与发展。据《全宋词》一书所辑,当时的词家超过千家,篇章超过两万。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词人有苏轼、辛弃疾、柳永、李清照等人。他们的词曲,或雄壮豪放,或清闲婉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珍贵的遗产之一。诗词之外,唐宋散文也达到了先秦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古文运动扭转了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韩愈、柳宗元等大家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此外,在书法方面,以李阳冰为代表的篆书,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竞相争辉;颜真卿、柳公权这两位书法家则使楷书艺术达到真正的成熟。唐代画苑也是色彩纷呈、名家辈出,有姓名可考的画家达 400 人之多。以“画圣”吴道子为代表的人物、花鸟画,不仅画法极为精妙,而且在笔法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

在思想意识领域里,北宋中期出现了影响整个后期封建社会发

展的理学。理学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的产物,是儒学发展的新形态,因而被称为新儒学,亦称为宋明理学。它大体经历了由周敦颐到程颢、程颐兄弟,最后由朱熹和陆九渊完成的过程。周敦颐引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学,建立理学的宇宙观,其代表作《太极图说》便是《易经》与道家观念的混合体。程颢、程颐兄弟则指出宇宙间有一定的不变之“理”,推之四海而皆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是一种绝对存在,但这“理”并非玄虚,“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皆是这“理”的具体显现。这就沟通了宇宙与伦理,视人世的伦常道德为一种“理性本体”,并建立了以“理”为本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使传统儒学走向哲理化。朱熹还把儒学的伦理纲常加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他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强调“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功夫。理学思想一方面有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个人情感欲求的禁欲主义色彩;但另一方面,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学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人格气节和道德情操、注重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感的文化性格。

五、明清:中国文化的转型期

明清两代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旧的封建制度日趋没落,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与发展,“西学东渐”又使中国人大开眼界,这些因素促使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转型期。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出现剧烈动荡,受传统文化熏染的士大夫面对清朝的专制统治,内心的痛苦变得愤激沉郁,又顺应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建筑设计制度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便自然而兴。这一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他们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学展开论战,其批判锋芒有的直指专制君主。黄宗羲指出,至高无上的君主实际上不过是一“独夫”而已,是“为天下之大害者”;王夫之则强烈主张“公天下”,反对“以天下私一人”。这种对君主制度的批判打破了君主的神圣性,是对民主精神和自身价值的呼唤。启蒙思想家们在经